

《唐代科举的文学世界》(研文出版)考察了与科举纠缠在一起的考生意识与表现世界的变迁。冈本洋之介《面对士大夫的科举》(《中国语言文化研究》9)论述了诗赋成为考试科目给士大夫带来的意识变化。渡边信一郎《雅乐的传来之路》(《东亚世界史研究中心年报》2)指出日本雅乐的源流是由遣唐使导入的西域系“唐乐”,平安朝初期的乐制改革是外来音乐的日本化。李志生(河上洋译)《雪胸与羸羸》(《研究论集》《河合文化教育研》6)根据以墓室壁画为主的绘画资料,追述了唐代女性袒装流行的变迁。又,中村裕一《中国古代的年中行事》第一册春、第二册夏(汲古书院)运用庞大的史料,复原了唐以前的年中行事(指一年中的节日和其他活动——译者),是一部十分耗费精力的大作。

如开头所说,去年特别以年轻研究者为中心,研究国际关系和非汉族的论著很多。这是近年由石见清裕、妹尾达彦、森安孝夫等提倡的视角——将隋唐置于欧亚大陆史、重视游牧农耕交界地带——渗透的结果。今后将唐后半期至五代、辽纳入视野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进展。此外,在依据《天圣令》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律令进行再探讨的进程中,不仅限于各条文的修正,而且会在更大的框架内提出问题吧。

不过另一方面,对政治、财政,以及军制、官制等诸制度,或者中国内地社会的讨论,总体来说不够热烈。这一点令人担心。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19编第5号《2009年的历史学界》

2009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日)渡边健哉(东北大学 日本仙台)撰

蔡春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编译

首先庆贺引领日本宋代史研究前进的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汲古书院)一书出版。本书从国制、地域、个人三个方面探讨了宋代中国的社会。此外,还有小川快之《传统中国的法和秩序》(汲古书院)、吾妻重二《宋代思想研究》(关西大出版社)、横山伊势雄《宋代文人的诗和诗论》(创文社)、松尾肇子《词论的成立和发展——以张炎为中心》(东方书店)、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书店)等专著出版,相关介绍可以看专门的书评。

概观去年的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史研究,可以看到去年的研究延续了近几年的研究趋势,与宋相关的辽、金、西夏、高丽以及蒙古史的研究继续活跃。宋代史研究会的研究报告集《“宋代中国”的相对化》(汲古书院,以下略记为《宋代中国》)的出版,也许可以看作这一现象的象征。其研究计划是否成功姑且不论,只从书名来看,确实反映了近年的研究倾向。下面,为方便起见,我按照规定的条目,回顾一下去年的研究。

五代。森部丰《唐末五代宋初华北东部地区的吐谷浑和粟特系突厥》(《辽金西夏研究的现在》2),利用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石函,向我们展示了宋代时粟特系突厥在河北发展的情况。山崎觉士《五代的“中国”和平王》(《宋代中国》),分析了“平王”号的授与,并认为这是当时中国区别国内、国外的“国境设定装置”。

政治、制度。去年对文书的研究非常多。小林隆道《宋代“备准”文书和情报传达》(《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7),分析了朱熹《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指出“备准”是“转送”文书内容的意思,这在南宋使用得很多。如果象文章小结中谈到的那样,这反映了北宋和南宋政治结构不同的话,意义深远。同氏《宋代使帖“文书”的样式和机能》(《史滴》31),分析了苏州玄妙观现存的“使帖”,推测“使”是节度使的意思,探明了唐末确认的“使帖”这一样式文书,从北宋到南宋发生的变化。船田善之《从颁发给日本的外交文书看大蒙古国文书形式的展开》(《史渊》146),介绍了“大蒙古国国书”和“中书省牒”,同时一定程度保留了文书的原型,这很重要。中岛乐章《八思巴字在元代文书行政中的使用规定》(《东方学报》京都84),考察了八思巴字的使用规定,追寻了八思巴字使用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希望这类文章不断增多,让我们能逐步看清宋元时期文书的性质。

其次,政治史方面。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新的可能性》(《中国史学》18,2008),回顾了以往的研究史,并提出了关于政治史研究新的方法论。黄宽重(见城光威译、妹尾达彦审译)《两宋时代的政策和士风的变化》(《中国——社会和文化》24),追寻了“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在两宋间的发展变化,探明了南宋基层社会的形成过程。富田孔明《宋仁宗朝的荐举和党派形成的问题》(《东洋史苑》73),论述了范仲淹、杜衍等形成党派的过程,认为荐举制是党派形成的主要原因。对于如此形成的党派成员间的联系,富田用“强力”来表现,但实际上其本身就具有强固的纽带关系吧。藤本猛《崇宁五年正月的政变》(《史林》92-6),抓住徽宗即位后政局的发展这一线索展开论述,认为徽宗和蔡京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是徽宗第一次当政时期政变发生的背景。这篇文章是将近年宋、辽交流的研究反映到宋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好例子。南宋政治史方面,小林晃《南宋宁宗朝史弥远政权的成立及其意义》(《东洋学报》91-1),列举出土大夫的舆论,认为这是南宋设置资善堂会议和宰相直辖枢密院承旨司的理由,以此为基础,史弥远政权的长期运营才成为可能。吉野正史有两篇元代方面的文章发表,《乃颜之乱中元朝军队的阵容》(《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4-4),分析了镇压乃颜之乱时元朝军队的动向和编制。《元朝的乃颜、哈丹之乱》(《史观》161),分析了继乃颜之后哈丹复叛时元朝军队的编成,并将这两次叛乱进行了比较,重新确定了这一叛乱在忽必烈统治后期政治倾向中的地位,认为此时军队的编成,成为铁穆耳即位的契机。赤坂恒明《和世刺的西行和拜答儿裔察合台家族》(《东洋史研究》76-4),探明了天历内乱之际和世刺的动向,因为史料少的缘故,因而堆积了一些可信性较高的证据进行论证。

制度方面。久保田和男不仅对宋代开封有所研究,对情报传达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宋代中央情报向地方的传达》(《宋代中国》),认为邸报和小报是中央向地方传达情报的手段,这种形式反而带来了地方向中央的政治统一。宫崎圣明《宋代禁谒制度的展开》(《宋代中国》),追寻了禁止、限制官僚和宾客会见这一禁谒制度适用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宋代的特征——即使细微之处也在法律上明文化,这篇文章从政治、制度、法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

了讨论。与座良一发表了两篇北宋军制方面的文章,《熙丰年间的军制改革》(《鹰陵史学》35)将新旧两党的对立作为军制改革的切入点进行探讨,可文章中并没有展现双方对立斗争的实景。《北宋的将兵法》(《东洋学报》91-3)追寻了更戍法转变为将兵法的过程。曹家齐(山崎觉士译)《南宋临安府周边的邮传系统》(《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东亚海域世界的交通、交易和国家的对外政策》)追溯了邮传制度的沿革,复原了邮传路线。但文章中存在日语翻译方面的错误。片桐尚《元代吏员出身者的升迁》(《大正大学东洋史论集》2),分析了省掾的升迁倾向。

国际关系。延续去年的研究倾向,今年对宋与高丽、宋与日本、宋与辽金两国间或多国间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数量很多。这种局面的出现,我们不能忽视2010年3月完成的特定领域的研究《东亚海域交流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广濑宪雄一直致力于对册封体制的重新认识,他的《唐后期及北宋的外交礼仪》(《史学杂志》118-7)将外交礼仪的变化和听政制度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除契丹外,北宋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都存在着君臣关系基础上的礼仪规范。将契丹(辽)特别看待的文章,我们还应关注毛利英介《十一世纪后期北宋的国际地位》(《宋代中国》),该文试图重新定位契丹在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位置,企图摆脱宋代中心说的传统认识。对“高丽公案”的史料批判方面也有很多精彩的论文出现,都收入《“宋代中国”的相对化》一书中,文章从政治、外交方面很好地体现了“相对化”这一主题。丰岛悠果①《1116年来宋的高丽使节的经历》(《朝鲜学报》210)和②《高丽的宴会礼仪和宋的大宴》(《宋代中国》)及翻译③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的往来和丽宋外交》(《年报朝鲜学》12)发表了。①文具体介绍了1116年高丽使节来宋的活动,认为使节将其体验记录带回了高丽。该文长达36页,为何没有记载最有意义的新年庆祝活动的情况。②文循着“使节的见闻”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认为高丽国王主持的作为宫中庆祝活动的宴会,模仿了宋朝的宴会礼仪。③文认为宋朝使臣是乘坐宋商人的船来到高丽,那么宋使来和宋商来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丰岛的文章比较,该文给人的印象是以大框架提示读者。榎本涉一直致力于从日本史方面来探讨宋元时代的海域交流,他的《从日本的墨迹史料来看南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仔细分析了宋元时期中国僧人的亲笔信(墨迹史料)及其相关史料,探讨了抽解、博买的征收率和船员的构成,是一篇关于传送贸易方面具体情报的重要论文。山崎觉士《从书信看宋代明州的对日外交》(《东亚世界史研究中心年报》3),认为宋代当时的对日外交,很多都是在日船登陆地明州进行的。森平雅彦《宋使船在黑山诸岛海域的航线》(《朝鲜学报》212),依据实地考察的成果来进行比照、推测岛名,更有意义的是该文推测济州岛是海上航行时的陆上标志。

社会。家族、宗俗方面,有大泽正昭《宋代士大夫的“兴盛之家”防卫策》(国方敬司、永野由纪子、长谷部弘编《家的存续战略和婚姻》,刀水书房),以《袁氏世范》为题材,探明了家族存续的状态。小林义广《欧阳修和母亲郑氏》(《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3),讨论了欧母郑氏的有关问题,叙述了思念母亲的欧阳修在晚年的人生观。冈元司《宋代明州的史氏一族和东钱湖墓群》(东亚美术文化交流研究会编《宁波的美术和海域交流》,中国书店),依据对东钱湖墓群的调查,对史氏一族进行了考察。一个社会将几岁之前的人定作小孩,是反映社会性质的关键问题,大岛立子《元代的小孩和成年人》(《爱大史学》18)认为在元代,这个规定年限

是 10 岁。梅村尚树《宋代地方官学的兴起及其象征》(《史学杂志》118-6),以文翁的彰显为线索,触及到该如何认识地方官学这一热点问题。木村明史《宋代药方的颁布》(立正大《东洋史论集》18),论述了宋代药方的颁布问题,但因没有注意到地域、年代的差别,文章给人以呆板的印象。盐卓悟《宋代食羊文化和周边国家》(《宋代中国》),分析了北宋羊肉的消费形态和食羊文化在开封的地位。冈元司《南宋时期疫病多发的两浙路》(《东亚海域交流史现地调查研究》3)叙述了两浙路的疫病多发和环境的关系,并对东亚海域世界的相关课题给予了提示。矢泽知行《元代的漕运、盐业和两浙社会》(《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探讨了漕运、盐业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关系,除宁波外,还指出了昆山州、刘家港的重要性。村冈伦《蒙古时代的山西平阳地区和诸王的权益》(《13、14 世纪东亚史料通信》10),讨论了与现存于山西省高平县圣姑庙的“阿识罕大王令旨碑”相关的几个问题。向正树《蒙古统治时期福建沿海一带的穆斯林官员层》(《阿拉伯、伊斯兰研究》7)指出了入住福建的穆斯林商人的特征。

科举。正如近藤一成在其论著中指出的,近年来中国的“科举学”正在兴盛起来。朱刚(浅见洋二译)《北宋的贤良进卷》(《中国——社会和文化》24),关注科举的答卷,提示了如何阅读难解的答卷的方法。樱井智美《元代哈刺鲁人的仕宦与科举》(《明代亚洲史论集》13),指出作为军户屯驻在庆元的哈刺鲁人,因为不必从军便开始了应试科举的学习,这成为色目人提高儒学教养和诗文写作能力的手段。渡边健哉《从科举制看元大都》(《宋代中国》)考察了在元大都进行的关于科举的活动。

都市、经济。梅原郁《日本和中国的出土钱》(《东方学》118)一文引发了一个大问题。他认为日本的出土钱和当时社会的流通钱没有关系,而且也不能反映当时货币经济的状况,可能他并没有参考三宅俊彦近年对日本和中国出土钱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期待着日本史研究者的回应。宋钱方面,伊原弘编《宋钱的世界》(勉诚出版)出版了。井黑忍《从区田法的实施所见金、蒙古时期的农业政策》(《东洋史研究》67-4),仔细探明了区田法这一政策的决策过程,追寻了从金到元同一政策的意义是如何变化的。伊原弘《宋元时期的南京城》(《比较都市史研究》28-1)考察了不太受人关注的宋代的南京城,但这篇文章中有多处误字、脱文,不管论点如何,这种细节应该注意。武田和哉《关于契丹国(辽朝)上京临潢府故城的占地和遗构复原的考察》(《辽金西夏研究的现在》2),特别强调了东向的全部平面图,举出了现存的平面图应改正的几个地方。高桥弘臣《南宋临安的三衙》(《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 26),指出三衙的职务逐渐扩充。

辽金西夏。武田和哉《契丹国(辽朝)的宰相制度和南北二重官制》(《宋代中国》),举出相关的基本史料,对辽朝的宰相制度进行了重新探讨。高井康典行《辽朝士人层的动向》(《宋代中国》),探讨了武定军节度使统辖区内士人阶层的动向。指出起初因藩镇介于其间,故士人与地方官有紧密的联系,但到了辽末,他们靠科举、纳粟补官等途径直接与朝廷发生联系。工藤寿晴《辽许从贇墓志铭考释》(《白山史学》45),解读了许从贇墓志,考察了燕云十六州回归后云州的情况。近年中国史领域中“首领”一词也受到关注,佐藤贵保《西夏语文献中“首领”的用例》(《环日本海研究年报》16)列举了有关“首领”的事例,指出“首领”一词用于具有一定规模的集团、组织的责任者、监督者。他的另一篇文章《俄藏西夏文〈天盛禁令〉第二五八五号断片》(《西北出土文献研究》7),尝试比定该断片相当于《天盛禁令》的哪一部分。藤原

崇人《萧妙敬和徒单太后》(《宋代中国》)认为在金朝佛教界,不能忽视出生于契丹本地的人的影响,海陵王迁都也促进了契丹佛教界人才的迁徙。饭山知保《金元时代的稷山段氏》(《宋代中国》)仔细追寻了从北宋到元代,段氏顺应出仕途径的变化,顽强生存的状况。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代的研究大多利用了石刻资料。

史料。小林晃《郑真辑〈四明文献〉的史料价值及其编纂目的》(《北大史学》49),指出明人郑真辑录的《四明文献》中收录了此前不为人知的宋人、元人的文章。须江隆《宋代地志序跋文考(二)》(《日大〈人文科学研究〉》6),对乾道《四明图经》一书所付清人的序跋文进行了译注,并讨论了明州地志的渊源。水越知《关于李昌龄〈乐善录〉》(《东方宗教》113),考察了宋代通过科举应试普及善书《乐善录》的原因。大岛立子《新出〈至正条格〉介绍》(《前近代中国的法和社会》东洋文库),介绍了关于《至正条格》的最新研究动向,并将之与《通制条格》比较,指出《至正条格》更具有作为一部法典来整理的痕迹。石刻资料的目录有榎并岳史整理的《宋代神道碑目录》(《资料学研究》6)和森田宪司《可见元代石刻拓影目录稿》(奈良大学《综合研究所所报》17)。另外,在这里介绍一些史学史方面的文章。小林昭夫《露伴的蒙古史研究》(《无穷会〈东洋文化〉》103)视角独特,但也应该谈谈明治40年代时,幸田露伴是如何开始此研究的吧。中见立夫《〈元朝秘史〉传入的时候》(《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探讨了那珂通世如何得到《元朝秘史》,以及他与清代学者的交流。

思想。加藤真司《经书解释中所见苏轼的义利观》(《中国哲学》37),将政治立场不同的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义利观加以比较研究。田中秀树《朱子学的君主论》(《中国思想史研究》30),讨论了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般看法,认为理想的君主应是天理本身与化“规矩即自由”的结合。石立善《从〈诗童子问〉和〈陈克斋先生集〉所见朱子语录佚文》(《中国文史论丛》5),从两书中分别辑出了30条、11条佚文。

佛教、道教。关于辽代佛教,藤原崇人有两篇论证细致的文章发表。《契丹(辽)的授戒仪和不空密教》(《辽金西夏研究的现在》2)依据房山石经《发菩提心戒一本》和山西应县佛宝寺发现的《受戒发愿文》,指出不空密教在契丹社会广泛存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契丹(辽)的立体曼荼罗》(《佛教史学研究》52-1),弄清了辽宁省中京大塔壁面装饰的内容,并阐述了其意义。福島重《元代华北的寺院住持》(《大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26)叙述了少林寺历代住持的经历和法系等,如果能将住持的选任方法等问题也稍微分析一下就更好了。道教方面,酒井规史《〈道法〉中道术的交流》(田中文雄等编《道教和共生思想》,大河书房),简要介绍了南宋的《童初正法》和《玉堂大法》。松下道信《赵友钦、陈致虚的性命说》(田中文雄等编《道教和共生思想》,大河书房)探讨了元代这两个道士所倡导的性命说。新井晋司《赵友钦的天文学》(《东方学报》京都84),分析了赵友钦的天文学。

文学。这方面的相关文章不可能一一列举。宋代文学中关于苏轼、黄庭坚的论著很多,浅见洋二《从校勘到生成论》(《东洋史研究》68-1),注意到宋人对苏轼、黄庭坚诗文的注释只是一个草稿本,并对其改订的经过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现在文学论中“生成论”的观点在宋代已经产生,这一点很有意义。冈本不二明《斋郎考》(《中国文史论丛》5)从各种史料入手,赋予“斋郎舞”历史的地位。奥野新太郎《元代文学中的“采诗”》(《九州中国学会报》47),注意到元代以江西为中心的“采诗”行为,认为其具有很强的让自己的诗留传下去的思想。

译注。正在进行的《朱子语类》的译注出版了一本书,即兴膳宏、木津祐子、斋藤希史《朱子语类译注 卷十、十一 读书法》(汲古书院)。与此相关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展开,还出现了如下译注:高山大毅《卷九十四译注(七)》(《汲古》55),恩田裕正《卷九十四译注(八)》(《汲古》56),恩田裕正《卷八〈总论为学之方〉篇译注(一)》(《中国哲学研究》24),名畑嘉则、加藤真司《卷四十六 论语二十八 季氏篇译注》(《中国哲学》37),野口善敬、广田宗玄、本多道隆、森宏之《卷一二六〈释氏〉译注(二)(三)》(《东洋古典学研究》27、28),ICIS《朱子语类》研究会《礼关系部分 译注(一)》(《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5)等。小林义广《宋代地方官的民众善导论》(知泉书馆)将所在学校的纪要中连载的宋代观农论《琴堂谕俗篇》的译注进行了汇总整理。此外还有市来津由彦《〈朱文公文集〉跋文译注稿(七)(八)》(《东洋古典学研究》27、28)。

展望。延续去年的研究倾向,尝试对某一现象或地域从中长期的视角来把握的文章,以及关注两国或三国间关系的文章引人注目。不局限于某一王朝史的研究步伐也向前推进了一步。因此,我们在进行传统方式研究的同时,还应把近年辽金西夏史的研究成果反馈给宋史研究者,反过来也是如此。本人深感研究这一时代历史的人共享近年研究成果,及研究者同行之间,有加强对话的必要性。

最后让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去年3月22日津田芳郎先生、10月3日冈元司先生去世了。两位先生作为教员,在研究和培养学生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他们更放心不下日本宋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让我们在衷心祝愿二位先生冥福的同时,拿出优秀的研究作品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19编第5号《2009年的历史学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简介

许海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华北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历史教学与科研的迫切需要,成立了世界历史教研室,上述两大教研室直属校部管理,负责全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并且展开科研活动。1956年,历史系正式成立。在文革时期,学校一度解散,历史系亦随之合并转入其他高校相关院系。1978年,中国人民大

学复校,历史系得以重建。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人文学院,包括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以及清史研究所。2005年,历史系与清史研究所合并组建历史学院。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在此辛勤耕耘过,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何干之、尚钺、戴逸、李文海等教授曾先后主持历史系工